



新世纪第二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
暨第八届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集

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拓展

HANYU YIFA YANJIU DE XINTUOZHAN(二)

主编 邵敬敏 陆镜光

● 浙江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第二届现代汉语
语法国际研讨会
暨第八届现代汉语语法
研讨会论文集

汉语语法研究 的新拓展(二)

HANYU YUFA YANJIU
DE XINTUOZHAN

主编 邵敬敏 陆镜光

●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拓展. 2/邵敬敏, 陆镜光主编.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5: 2
ISBN 7-5338-5599-X

I. 汉... II. ①邵... ②陆... III. 汉语—语法—研究—汉、英 IV. H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31443号

责任编辑 潘晓东 封面设计 曾国兴

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拓展(二)

——新世纪第二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
暨第八届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集
邵敬敏 陆镜光 主编

*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邮编310013)
网址: www.jys.zjcb.com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4 1/32 印张 13.75 插页 4 字数 400 000
2005年2月第1版
200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本

*

ISBN 7-5338-5599-X/H·15

定 价: 16.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詹伯慧/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1
邢福义/说“生、死”与“前”的组合	15
戴耀晶/现代汉语否定表达的语义确定性问题	25
张谊生/现代汉语羡余否定现象探微	37
邵敬敏/“别”字句语法意义及其对否定项的选择	51
尹世超/否定性答句及其分类	67
玄 玥/论焦点标记对焦点敏感算子的制约作用	84
Haihua PAN and Peppina LEE Po-lun/ Focus and Negation in Chinese	97
李葆嘉/汉语的词语搭配与义征的提取辨析	128
沈 阳 董红源/“直接统治”与第三人称代词“他”的句内所指 规则	143
古川裕/“怕”类词的句法功能及其扩展机制 ——“怕”“害怕”“可怕”“哪怕”“恐怕”“怕是”等词语的内 在联系	171
石定栩/语用、语义与句法互动的适用范围 ——由从句中动词前的受事短语说起	188
税昌锡/论语义指向的内涵	198
杨海明/名词的性状性与“副+名”框架 ——真实文本中“副+名”框架与名词入框动因的竞争与 避让	216
陈昌来/工具的语法地位、类别及其隐现规律	227
Han Yang/A Case for Relative Tense in Chinese	241
朱 彦/汉语复合词的语义结构分析	260

陆镜光/延伸句的跨语言对比	276
陆丙甫 徐阳春/汉语疑问词前移的语用限制 ——从“话题焦点”谈起	291
高 华/关于汉语陈述疑问句	307
詹卫东/广义配价模式与汉语“把”字句的句法语义规则	329
张宝胜/副词“还”的主观性	348
张亚军/总括范围与强调极性:副词“都”的功能演变	358
周国光/汉语时间系统习得状况的考察	370
彭小川 赵敏/广州话“晒”与普通话相关成分的比较研究	385
梁慧敏/香港粤语的疑问语气助词	398
郑雅丽/从语言学看修辞手法:拟人格、移就格、拟物格的再分析	415
周娟/第二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综述	425
后记	436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詹伯慧（暨南大学中文系）

1 回顾——从方音研究到方言语法研究

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从方言语音的调查开始。方言语音最能直接、具体地显示方言的特点，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正因为这样，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我国开始采用国际上通用的语言学方法来调查研究汉语方言以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汉语方言的研究几乎完全被方言语音的研究所包揽。于是乎，出现在图书馆和语言学者书架上的汉语方言著作，就以某某音系之类的方音研究著作作为最多。20世纪40年代以后问世的几部大型方言调查报告，如《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以及后来陆续在台湾出版的《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云南方言调查报告》和《四川方言调查报告》等，每部的字数都超过百万，打开一看，其内容都是清一色的方音描写和记录，以及方音和中古语音的比较。至于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乏人染指的状态。上个世纪50年代，为配合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工作的开展，举国上下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方言普查。但那次普查旨在找出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以帮助方言区人民更好更快地掌握普通话语音。普查工作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方言语音的记录整理以及揭示方言与普通话语音的对比工作，自然也就无暇顾及方言词汇、方言语法的问题了。20世纪60年代初，在方言普查工作基本完成之际，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丁声树先生在学部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上就汉语方言工作作了发言，提出今后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应以词汇、语法为重点，“而现阶段则特别应把方言词汇作为重点来抓”。丁先生的意见发表在1961年3月号的《中国语文》月刊上，一向少人问

津的汉语方言词汇,开始受到方言工作者的瞩目,在语言学术刊物中,方言词汇研究的文章陆续出现,一扫长期以来只能看到一两本记录研究北京方言土语的著作(如陆志韦先生的《北京话单音词汇》、张洵如先生的《北京话轻声词汇》等)的局面。至于汉语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始终处于沉寂状态,除了零星发表在《中国语文》、《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等刊物上几篇介绍个别方言某些语法特征的文章外,论述汉语方言语法的专著,能看到的公开出版物就只有台湾南风书局于1950年出版的李献璋著《福建语法序说》了。直到张洪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所写的硕士论文《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一书在1972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才出现了逐步发展起来的势头。我和黄家敦先生曾于1965年在《中国语文》第三期发表《谈汉语方言语法材料的收集和整理》一文,论及有关收集整理汉语方言语法材料的一些问题,当时我们是受丁声树先生1961年那篇呼吁重视汉语方言词汇语法研究的文章所感召而开动脑筋考虑起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问题来的。在那篇文章中,我们就汉语方言语法材料的收集汇总和整理分析谈了一些来自实践的初步想法。在收集方言语法素材方面,我们谈到如何收集、从哪些方面收集、在收集时必须注意哪些问题,如记音的准确性问题,方言中新旧因素并存并用的问题等等;在整理分析方言语法现象方面,我们谈到如何进行方言语法材料的审核、分类和归纳整理;至于如何开展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问题,我们提出在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刚刚起步之际,缺乏有关汉语方言语法体系的资料可供参考,不妨参考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语法体系,首先把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建立在方言和民族共同语相互比较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来认识方言中存在的语法特点,不失为可行之路。当时可供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材料实在太少,我们在那篇文章中所归纳分析的一些方言语法现象,自然是挂一漏万、很不全面的了。可就是那样一篇在20世纪60年代几乎是唯一一篇谈论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文章,在那个汉语方言研究基本上仍处于方音研究一花独放的年代,对于提倡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来

说,多少还是起了一点“点火”的作用。说实在,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毕竟还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渐引起方言工作者的关注。尽管早在1972年就出现了张洪年的《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一书,但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真正“起飞”,却应该说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的事。作为方言语法研究的专著,继上述张洪年的粤语语法专著之后,台湾罗肇锦在1984年由学生书局出版的《客语语法》,就算是比较早面世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专著了。而恰恰这两部专著都不是由中国大陆的学者执笔的。在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刚刚热闹起来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初期还主要是在刊物上有一些单篇的研究论文出现,还来不及编写系统揭示某个方言语法的专著。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创刊于1979年的《方言》杂志在倡导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推动汉语方言语法研究迅速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份被认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方言研究专业期刊,一诞生就把推动汉语方言研究朝着语音词汇语法齐头并进的路向发展作为办刊的指导方针之一。早在创刊不久的1980年第3期,《方言》就发表了朱德熙先生结合方言现象论述汉语中“的”字的论文《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的“的”字》,引起了语言学界的瞩目。据初步统计,从1979—1998这20年间,描写、分析、讨论有关汉语方言语法现象的文章在《方言》发表的就有120多篇。占《方言》二十年间所刊全部文章的18%,比所刊方言词汇研究的文章还要多。《方言》编辑部显然是有意要在刊物上组织起对一些方言语法问题的讨论,如西南官话中的重叠式,在1987年一年间就刊出了九篇论文。最近几年《方言》刊出的方言语法文章仍然保持着相当的比重:1998年和1999年各有10篇,2000年有9篇,2001年有12篇,2002年有4篇。把这些数字加到上述20年间发表的120多篇中来,累计自1979年创刊至2002年年底,《方言》刊出的研究汉语方言语法的文章,总数就达175篇之多。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所谓“强势方言”的粤方言在方言语法研究方面的形势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从詹伯慧主编的《广东粤方言概要》一书《附录》的《广东粤方言研究文献选录》(詹伯慧,2002)可以看到,该《文献选录》共选录篇

目1445项,其中201项是属于粤方言语法研究的。这201项中,只有8项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其余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发表的。在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方言语法研究受到重视的程度之所以能够与日俱增,跟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反复强调和身体力行,认真实践是分不开的。早在半个世纪以前,袁家骅教授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开设“汉语方言学”课程时,就在课堂上一再强调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将有助于打破印欧语言语法体系对汉语语法研究的桎梏。他认为在大量汉语语法事实的支撑下,真正符合中国语言实际的、体现汉语特色的语法体系就有可能产生。袁先生当年没有多少时间来专门研究汉语语法,而朱德熙先生则通过自己长期深入的汉语语法研究,深切体会到要把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好,非着力把标准语(普通话)语法的研究和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及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结合起来不可,这也就是语法学界通常所说的语法研究的“大三角”理论。早在1985年,朱先生在为日本著名汉学家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作序时就指出:“研究现代汉语的人往往只研究普通话,不但不关心历史,把方言研究也看成隔行,画地为牢,不愿越雷池一步。这不管对本人说,还是对学术发展来说,都不是好事。”他还以他自己对“的”字研究过程的反思为例语重心长地说:“我在这里把自己三十年来在研究‘的’字的过程中已经觉察到的疏忽和失误提出来,这也许可以作为今后语法研究工作中的一点小小的借鉴。”(朱德熙,1993)。正是在这一观点的左右下,朱先生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发表了多篇贯彻“标准语语法——方言语法——历史语法”三结合的重要论文(朱德熙,1980,1985,1991),用语言事实有力地论证了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认真贯彻“三结合”精神的重要作用。在朱德熙先生辞世以后,《方言》编辑部发表了他的遗稿《从方言和历史看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更使我们进一步看到朱先生如何在他的语法研究中大力贯彻他自己经过长期实践后总结出来的语法研究“三结合”的重要理论。朱先生生前所提出的这一汉语语法研究指导思想,无疑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包括现代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一次重大革新。

它使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和研究汉语方言语法的人都大大开了窍,使彼此的研究工作有了新思路,进入了新境界。这也就自然而然地开通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者和汉语方言研究者之间在研究理念上相互沟通、相互协作的新渠道。打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不断升温,持续发展。从这十来年发表的著述来看,其中不乏成功之作明显是受了朱先生立论的影响而在努力贯彻“三结合”的理论的。众所周知,邢福义教授就是和朱德熙先生持同一见解,大力贯彻这一理论的一位语法学家。他在《方言》先后发表的《从海南黄流话的‘一、二、三’看现代汉语数词系统》、《说‘你们’》、《小句中枢纽说的方言实证》以及《‘起去’的普方言检视》等文章(邢福义,1995、1996、2000、2002),就是很好的范例。邢先生的弟子汪国胜教授的《大冶金湖话的‘的’‘个’和‘的个’》等方言语法专论也是在朱先生和邢先生语法研究理论的指引下撰写成的。

综观近二十多年汉语来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情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主要是发表在《方言》以及有关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日渐增加,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除了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论文以外,以专书形式出现的汉语方言语法论著也陆续出现,一扫长期以来汉语方言语法著作寥若晨星的局面。下面是迄今我们能看到的一些近期出版的汉语方言语法著作:

[专著]

- 台湾闽南语语法稿(杨秀芳,台北大安出版社,1991)
- 客家方言语法研究(何耿镛,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
- 大冶方言语法研究(汪国胜,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 内蒙古西部方言语法研究(邢向东、张永胜,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 上海话语法(钱乃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项梦冰,语文出版社,1997)
- 苏州方言语法研究(李小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上海方言语法研究(徐烈炯、邵敬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晋方言语法研究(乔全生,商务印书馆,2000)

鄂东方言语法研究(陈淑梅,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成都方言语法研究(张一舟、张清源、邓英树,巴蜀书社,2001)

汉语方言代词研究(张惠英,语文出版社,2001)

海南屯昌闽语语法研究(钱莫香,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林寒生,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论文集]

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胡明扬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动词的体(张双庆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6)

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伍云姬主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湖南方言的介词(伍云姬主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汉语方言共时与历时语法研讨论文集(伍云姬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湖南方言的代词(伍云姬主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动词谓语句(李如龙、张双庆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

代词(李如龙、张双庆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以上共22部,可能还有遗漏。除此以外,在一些综合性的汉语方言研究著作中,也或多或少会有专门的章节论述方言语法。拿出版著作较多的闽南方言来说,尽管专以闽南方言语法研究为题出版的论著尚属罕见,我们却可以从近期刊世的综合研究某些闽南地点方言的专著中看到不少关于闽南方言语法的论述。例如周长楫、欧阳忆耘著《厦门方言研究》一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就以《厦门方言的造词法》和《厦门方言的若干句法特点》两章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厦门方言的词法和句法,让读者可以从中略窥闽南方言代表点厦门方言的语法面貌。又如刘纶鑫主编的巨著《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对江西的客赣方言语法就有详尽的描写比较,并说明各种语法特点分布在客赣方言的哪些地区。还有像李新魁、黄家教等著《广州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全书九章中语法部

分就占了三章,在全书585页中占了160多页;钱曾怡主编的《山东方言研究》(齐鲁书社,2001);侯精一、温端政主编的《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以及一些大型的省、市方言志,如吴积才主编的《云南省志·方言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殷焕先主编的《山东省志·方言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许宝华、汤珍珠主编的《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等等,也都有一定的篇幅描写论述方言语法。还有一点需要补充:从上列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专著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少数几本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初以外,其余都是1996年以后才问世的。可见尽管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渐成气候”,不断有这方面的论文见诸学术刊物,但汉语方言学者由针对汉语某一方言中的某一语法现象进行探讨、从而撰写专题论文,进而发展到对某一方言的语法面貌作系统的、全面的描写和论述,还得有一个在不断进行调查,不断积累资料的基础上一边建构理论方法,一边分析归纳语法事实的过程,这样的过程一般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完成,更不可能一蹴而就。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开始受到瞩目、逐渐“起飞”以来,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相互衔接的阶段:即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以单项单篇的分散研究为主的阶段发展到90年代中期以后对某个方言的语法现象进行全面探讨和对方言中某些突出语法现象进行专题探讨两者并举的阶段。毫无疑义,对方言语法现象进行单项专题研究是方言语法系统研究不可缺少的基础,要全面、系统揭示一个方言的语法面貌,缺乏众多单项研究成果的支撑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当方言学者开始把注意力扩展到研究方言语法整体面貌时,大量的单项专题研究仍然会是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主流。

2 前瞻——展望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未来走向

如前所述,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可以说进入

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完全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了。方言语法研究不受青睐、不受重视的历史已经过去,理论方法上的不断进步,前辈学者的带路引航,加上不断积累、不断丰富的方言语料和日渐增多的汉语普通话语法及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成果的相互支撑,应该说,如今正是汉语方言工作者可以在方言语法研究这个大舞台上大展拳脚、大显身手的黄金时刻。面对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大好前景,此时正宜好好总结过去,策划未来。依个人的管见,今后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倘若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多下功夫,必然会不断打开新的局面,不断获得新的成果。

2.1 调查、调查、再调查

汉语方言的研究主要取材于实地调查(田野调查)所得的口语语料。以往方言调查在语音、词汇方面下的功夫较多,积累的材料也比较丰富,而语法方面,相对来说是方言调查的薄弱环节,积累下来的材料比较少,这就需要从“备粮”做起,把“粮草”备足了,才有足够的力气“上战场”。方言语法材料的积累需要迈开双腿,走进方言实际中去开展记录、搜集的工作,因此,我们就要在此大声疾呼:大家都来为方言语法的研究多做调查,要调查、调查、再调查。记得十年前余霭芹教授在第四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香港城市理工学院,1993)上作题为《粤语研究的当前课题》的主题讲演时,首先提出的一项就是“粤语方言资料的收集”,她一再强调就汉语方言的研究来说,最要紧的是多作调查,多提供方言调查的语料,她认为从当时的情况看,可供方言研究使用的语言材料实在是远远不够。那时候我们刚刚花了好几年功夫做完对珠江三角洲几十个方言点的粗略调查并整理出版了三卷本《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她就特别提到此书,表示对这类工作的赞赏和期盼。事过十载,如今方言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方言的调查面有了很大的扩展,方言语料的积累也已大大增加,堪称今非昔比了。然而,对于起步较晚的方言语法研究来说,方言语法资料的搜集始终还是难以充分满足日益发展的方言语法研究的需求。因此,当1997年第六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在澳门举行时,余霭芹教授就亲自带来一些

汉语方言语法调查的问卷,请到会的年青朋友帮忙调查。其实这一方言语法调查的工作,她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甚至更早的时候就着手进行了。1993年在法国出版的那本《汉语方言语法比较》(英文版),正是她费尽心机,多方调查的一项成果。长期以来研究汉语方言语法的人都急切盼望能有一部能大致反映汉语方言语法现象的综合性著作。随着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不断发展,由黄伯荣教授主持、历经多年筹划编集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终于在1996年由青岛出版社出版问世了。此书取材于400多篇汉语方言语法论文和几十部汉语方言著作,按照一定体例整理归纳,以词法、句法的顺序排列,汇编成为收录汉语方言语法条目2500多、总字数180万、16开本800多页的皇皇巨作。尽管此书由于如实收录各方作者以各自不同的体系和方法来描写分析方言中的语法现象,难免带来了一些体例上、术语上未能统一,以至同样的方言语法现象在整理归类中偶有处理欠妥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当前方言语法研究材料缺口不小、能有这样一本材料如此丰富的《类编》供大家使用,编撰者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没。还应该一提的是:以黄伯荣教授为首的《类编》编者,在编写《类编》之余,从长期以来汉语方言语法调查缺乏较为完善调查大纲的实际需要出发,又充分利用《类编》所提供的大量方言语法材料,爬梳剔抉,选取一些例句,从词法和句法两个方面入手加以分门别类,设计、编写了一本《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手册》,于2001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对于汉语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无疑能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光靠一本《类编》再加上一本《手册》,是无法满足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的需要。最根本的“解渴”良方还是深入语言实际,调查——发掘,再调查——再发掘。对于任何一种汉语方言的语法研究来说,当务之急始终是通过调查汇集大量的语言材料,在掌握大量确凿可靠的语言事实之后,才谈得上整理分析,谈得上把方言中蕴藏着的特殊语法现象挖掘出来。总之,通过深入调查来挖掘汉语方言的语法特点,这是任何从事方言语法研究的人必不可缺的功课。一次调查不够就进行第二次调查、第三次调查,直到调查的材料可

以满足方言语法特点的发掘和分析为止。调查当然也应该包括别人的调查、同行学者的调查,不一定都要是自己本人亲历亲为的调查。如果每个方言区、每个方言点都有人做过详尽的语法调查,各人调查所得的材料就可能成为大家共享共用的宝贵财富,这就有可能在各自运用自己掌握的材料进行单点方言语法研究的基础上,进而开展汉语方言语法的综合研究,使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步步扩展,步步深入。要达到这一目标,说到底还是要再三强调资料积累的重要性,强调深入调查的重要性。这里再引用余霭芹教授的一句话:“方言资料是咱们研究的基础,资料不够就大大限制了研究的范围和结论。”(余霭芹,1993)

2.2 比较、比较、再比较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核心是比较。倘若没有比较,只停留在罗列现象、描写现象上,或者说,仅仅是反映一点方言语法调查的结果,说明方言中存在哪些语法范畴,有哪些表达的方式,这显然是很不够的。我们调查研究汉语方言语法,要能够步步深入,就必须通过我们在调查中掌握到的大量方言事实来进一步深入分析,从中挖掘出方言事实中所反映出来的语法特征,并竭力寻找出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特征也好,规律也好,都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够得出合乎实际的、科学的结论来。长期以来欧洲语言学中广泛采用的历史比较法,是具有特定范围、特定内涵的语言比较法。我们在汉语方言的研究中论及比较,一般总是指共时的比较和历时的比较,有时也指内部的比较和外部的比较。把共时和历时结合起来考虑,那就是既要做横向的共时的比较研究,也要做纵向的历时的比较研究。这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的研究,始终贯穿着比较的内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比较研究了。横向的比较研究往往透露历时发展的线索,而历时的比较研究又往往加深我们对横向比较中语言异同现象的认识。前面谈到朱德熙先生倡导的“标准语语法——方言语法——历史语法”三结合的语法研究模式,其实也就是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相结合的模式。朱先生发表在《方言》杂志上的最后一篇论文,题目是《从方言和历史看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

文中既拿几种方言的“的”和北京话的“的”作比较,又拿方言中的“的”和历史文献中的“的”作比较,正是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反复比较,仔细剖析了“的”字的种种不同表现,从而科学地论证了他所要阐明的命题: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现在我们要强调深化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这“深化”的路子如何走?我看,归根结蒂也就是要好好把握朱先生所倡导的这个“三结合”,也就是邢福义教授所说的语法研究的“大三角”。认真做好“三结合”的实践,把“大三角”研究的功夫做足做透,自然就会在深挖方言语法特点、揭示方言语法规律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并可由此而进一步对语言学理论上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近期发表的一些研究汉语方言语法专题的著述看来,“三结合”、“大三角”的理论已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占着主导地位,但除了这个“三结合”、“大三角”外,还有多方面的研究方法也值得我们重视,例如“类型学”的方法,把一些方言的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来考察,桥本万太郎教授的“语言地理类型学”理论(桥本,1985)就值得我们汉语方言语法研究者好好学习,认真借鉴。再如人们常说的语法研究中的另一个三结合——语形、语义、语用的三结合,也就是邢福义教授所说的语法研究的“小三角”,在方言语法的研究中同样应该受到重视。如果能够把“方—古、方—普、方—方”的三结合和“语型——语义——语用”的三结合结合起来考虑,对于探索汉语方言语法的特点和规律及其发展变化的轨迹,无疑将会有显著的效果。此外,汉语方言中语音—词汇—语法间的密切联系也应引起我们的关注。汉语方言中不乏通过语音的曲折变化,即通常所谓形态变化的方式来表现语法特征的实例,在方言语法研究中,注意语音、词汇、语法间的关系,这又是另一种三结合的考虑。总之,在汉语方言语法的探讨中,脑子里要多一点“结合”上的思考,而所有“结合”方面的研究,总是离不开“比较”这一总课题。可以说,在方言语法现象的调查研究中,处处可见“比较”的踪影,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比较”的重要性:比较、比较、再比较。用一句顺口溜来说,就是“比较是个宝,万万不可少。”

2.3 抓点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大工程,把方言语法研究推向新的台阶。

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自从20世纪80年代进入飞跃发展的历史时期以来,二十年间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有目共睹,堪称是史无前例。《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编成,《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1卷分地本和巨型的综合本,李荣主编)和五大卷《汉语方言大词典》(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的相继问世,为汉语方言学的建设树立了巍巍丰碑,在中国语言学史中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如前所述,汉语方言的研究在语法方面业已打破长期以来冷冷清清、明显滞后的局面,出现了日趋繁荣的势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此时此刻,方言研究者正宜乘胜前进,不断开拓进取,争取更大的丰收。而及时组织力量,打造几个方言语法研究的大工程,为汉语方言学的发展再创新的辉煌,更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成为今后当务之急。依个人的管见,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大工程,首先应是在现有的基础上,组织起各大方言区的汉语方言研究力量,着手编纂一批能够较好反映汉语各大方言语法面貌的综合性方言语法专著,以《丛书》的形式出版,如《粤方言语法》、《闽方言语法》、《吴方言语法》、《客家方言语法》等等,有了如实反映各大方言区语法面貌的综合性著作以后,接下来就有可能迈入第二步,再组织起一支方言学界强有力的学术队伍,综合吸取各地方言语法研究的成果,策划另一个方言语法研究的大工程:编纂起一部能反映汉语方言语法总体面貌的《汉语方言语法》来。至此,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也就有望登上一个“俯瞰众山小”的高山平台了。

参考文献

- 丁声树. 关于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一些意见[J]. 中国语文, 1961; 3
- 高华年. 广州方言研究 [M]. 香港: 香港商务印书馆, 1980
- 侯精一主编. 现代汉语方言概论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